

公共卫生、疾病与罪恶

——1860—1880年间法国游记中的北京书写*

鲍叶宁

摘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汉学家对中国的认识由书本转向实地调研，由侵华远征回到法国的军官及继之而来的外交官、探险家、记者的游记在法国大量出版，对中国的书写热情空前高涨。本文以1860至1880年间具有代表性的法国来华游记为研究对象，从清末北京的公共卫生状况入手，揭示这些法国游记作品如何表现皇朝帝都里的疾病与罪恶，探讨影响作者认知与书写的原因，并考察这些内容是否形成某种修辞以象征他们对北京、甚至中国的想象世界。

关键词：疾病 罪恶 颓废 法国游记 清末北京

中法文化交流史告诉我们，18世纪是中国文化对法国思想界发生巨大影响的时代，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法国在多次革命中自顾不暇，而清王朝国势由盛转衰，进一步闭关锁国，中法对彼此的注视和言说减少，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双方才重新开始接触^①。中法交流的早期，有关中国的研究和介绍一直以来都是耶稣会士的事情，汉学家对中国的认识来自书本，而实地调研的真正开启则要等到19世纪60年代^②。自此，在法国文学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对中国的书写，它们大多是从侵华远征中回到法国的军官和随军翻译的日记和回忆录，还

* 本文为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科研计划项目“1860年以来法国文学对北京的书写与想象”（项目编号：SZ202110031014）的阶段研究成果。

① 孟华：《中法文学关系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8页。

② Muriel Détrie, Jean-Marc Moura, “Introduction”, *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1(2001), p. 8.

有继之而来的探险家、传教士、记者的游记，这些刊载在报刊书籍中的信息使一些即使从未来过中国的法国作家，如儒勒·凡尔纳和朱迪特·戈蒂耶^①，也能够展开对中国的想象，尤其是后者，更是“直接开启了20世纪‘东游’的一代诗人，如谢阁兰、圣-琼·佩斯、亨利·米修等，对东方古国的文化探秘”^②。

1860年至1880年间在法国问世的有关中国的回忆录、日记、游记等文献材料只有数部作品有中文译本，它们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史料意义上，特别是有关劫掠圆明园的内容，而这些旅行文本作为文学体裁所具有的内涵被忽视了，换句话说，它们表现出来的科学与实证精神遮蔽了自身的想象世界。然而，19世纪游记的本质绝不是单纯意义的空间迁移所能定义的。伴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西方人远渡重洋来到中国进行历险，作为文学体裁的游记包含了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内容，游记作家对中国的地理、气候、民俗、法律、商贸、宗教、政治等诸多问题的介绍和讨论都在游记的叙述中展开，而另一方面，殖民主义的野心、对古老帝国的颓废叙事，甚至欧洲当时盛行的美学精神都能从游记中暴露出来。

处于这一时期的法国旅行者对中国社会的观察与想象既不是出于借鉴中国传统文明的需要，也有别于寻找所谓“真的中国”来反思西方现代性的期待，在写实主义的“一镜到底”中，除极个别例子，他们对晚清社会的表现几乎都是负面的，永远离不开缠足女性、鸦片吸食者等刻板印象，这些确实也是对颓废的中华帝国进行表现的最佳材料，但本文将从清末北京的公共卫生状况入手，揭示法国游记作品如何表现古老中国皇朝帝都里的疾病与罪恶，探讨影响作者认知与书写的诸多原因，并考察这些内容是否形成某种修辞，以象征他们对北京、甚至中国的想象世界。我们选择的四个文本分别是军医乔治·莫拉兹

① [法] 岱旺：《法国文学与中国文化》，叶莎、车琳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9年，第39、168页。

② 钱林森：《光自东方来——法国作家与中国文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2页。

(Georges Morache) 的《北京及其居民——卫生研究》、法国驻华公使夫人布尔布隆 (Madame de Bourboulon) 的《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先生和夫人的中国和蒙古游记》(后文简称为《中国游记》)、驻华公使罗淑亚 (Julien de Rochechouart) 的《北京及中国腹地》和法国驻北京公使馆翻译、著名汉学家冉默德 (Maurice Jametel) 的《北京——对中央帝国的回忆》。

一、基础设施与公共卫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越来越多的西方人随着中西贸易壁垒的清除踏上中国的土地。在这个被他们称作“中央帝国”的神秘国度里,都城北京显然是个特别的存在。有人叫它“中央帝国的绝世都城”,也有人叫它“天子的都城”。在19世纪的法国游记中,标题带有“北京”的作品不在少数,而北京其实只是这些作家在中国或在远东旅行线路中的一站。北京在西方人对王朝和天子的想象中有着无与伦比的位置。在《北京——对中央帝国的回忆》的前言中,作者冉默德就指出他的写作意图是记录对中国历代天子都城的印象。

清代的北京是个工整的四边形,分为两部分:北部是鞑靼城;南部是汉人城。鞑靼城的中央是皇城——即天子的住所,四周是具有防御功能的护城河和巍峨城墙。在鞑靼城和汉人城之间同样建有城墙,是统治者防范民间暴动的屏障。在19世纪下半叶的来华游记中,作者普遍会对北京城的南北划分进行介绍和强调,这一划分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它还构成了观察和想象的不同对象:鞑靼城是被当作清王朝的权力中心来看待的,而汉人城代表的则是居住在古老中华帝国中的人及其几千年不变的生活方式。

1859年,拿破仑三世派出远征军出征中国,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劫掠圆明园,《北京条约》的签订打开了中法关系的新篇章,自此,外国公使可以进驻北京。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游记》诞生了。

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先生及夫人于1861年入住北京纯公府，在此建立了第一个法国驻华大使馆。该作品分别从北京城全貌、北京市郊（圆明园）、北京的政治、文化、市民生活、风俗习惯、农工商业展开全方位介绍，展现出—个在建筑、艺术等方面达到顶峰，但在社会道德层面处于凋敝状态的没落帝国形象。

布尔布隆夫人乘坐马车穿梭于北京城当时可以向外国人开放的所有建筑，在她眼中，鞑靼城的道路是很久以前铺设的大理石，因为道路日久失修，早已风化破损，使坐在车内的人饱受颠簸之苦。和有专人负责清理的鞑靼城相比，汉人城表现出更胜—筹的衰败气象：脏乱、拥挤、嘈杂。汉人城虽然是代表着异国情调的所在，也是观察中华民族普通人生活的理想地点，但是作者明确地表示“在汉人城，密密麻麻的小巷和棚屋所引起更多的是厌恶而不是观赏的欲望”^①。它完全可以用“怪异”和“丑陋”来形容^②。在布尔布隆夫人的见闻录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车水马龙、人声鼎沸、脏乱无序的城市景观。街边有肩挑手提、沿街叫卖的流动摊贩：铁匠、剃头匠、小吃摊、说书人。构成移动街景的，除了往来的行人，还有规模庞大的搬运石头的马队、挑运粪肥的人以及衣衫褴褛的乞丐。街上到处是垃圾和灰尘。有的街道阴冷潮湿、狭窄逼仄，屋顶上长满了青苔，地上是稀泥状的东西，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恶臭。作者屡次用最高级别的形容词描写从汉人城各个角落中散发出来的巨大味道，并表示：“中国的肮脏是我们无法想象的。”^③在旅行者眼中，北京的城市景观是形成其城市观的重要因素，决定了他理解北京、书写北京的方式。

在同一时期的其他游记作者看来，不仅汉人城的路况令人绝望，北京整体的基础设施都很糟糕。乾隆皇帝曾经建设起的整套灌溉体系

① Achille Poussielgue, *Voyage en Chine et en Mongolie de M. de Bourboulon, ministre de France et de Madame de Bourboulon* (Paris: Librairie de L. Hachette et Cie, 1866), mise en format texte par Pierre Palpant, www.chineancienne.fr, p. 121.

② Idem.

③ Ibid., p. 130.

到了嘉庆年间已经破损严重，财政困难使水利工程的修复非常有限。贮存在京北水库中的水原本可以进入内城，流入田野，但是因为后来缺少清理，淤泥堆积，布满水生植物，不仅水路堵塞，还危害健康。人们甚至往下水道倾倒垃圾，一下雨，沟里垃圾溢出，散发出阵阵恶臭。《北京及其居民——卫生研究》的作者认为这些沟渠完全丧失了原有功能，并给居民健康造成巨大影响。下水道堆积的垃圾会招致野狗，而乞丐和它们争抢食物，有的乞丐甚至还以野狗为食^①。这种威胁公共健康的食物链是多么令人震惊，作者强调曾多次看到饥不择食的乞丐在街角吃着半生不熟的肉，根据他的观察，死去的动物不会在街上停留过久，除非它们已经过度腐化到连忍饥挨饿的人也不愿用以果腹。

《北京及其居民——卫生研究》(1869)一书的作者乔治·莫拉兹是一名随法国公使于1862—1866年驻京的军医。在莫拉兹看来，如果说北京的鞑靼城肃穆有序，仍有帝都的气派，那么汉人城则像中国其他城市一样：街道狭窄曲折、房屋排列凌乱、人口密集、街市嘈杂，满清政府无意建设汉人城，北京的南部完全是按照汉人自己的意愿和生活习惯规划建造的。汉人城的路冬天扬沙，夏天溅泥，每逢暴雨天气，交通立刻中断。作者将北京和巴黎的路相比较后感慨道：“当我们习惯了我们的欧洲的那些美丽的路，我们崭新的巴黎城里的富丽大道，我们都不敢想象没有了桥梁工程局的维护，道路将会多么破败不堪。巴黎人应该在北京住几天才会感激我们市政官的作为。”^②

这段文字可以看作是第二帝国时期的法国人对奥斯曼改造巴黎事业的极大褒扬了。但事实上，即使19世纪中期，巴黎的市容市貌也并没有好很多。在未经奥斯曼改造和治理之前的巴黎，泥浆的存在是大街小巷的一大特点。泥浆的内容极为丰富，除了居民的日常垃圾外，还有从生肉铺子扔出来的动物内脏和血液，它们混着雨水，形成一种

① Georges Morache, *Pékin et ses habitants, Etude d'hygiène* (Paris: Baillière et fils, 1869), mise en format texte par Pierre Palpant, www.chineancienne.fr, pp. 28–29.

② *Ibid.*, p. 20.

漆黑黏稠并带有臭味的混合物，在城市里肆意流淌、四处喷溅。巴黎的污泥浆液久负盛名，每逢暴雨过后，街道就泥泞不堪，夹杂着恶臭淤泥的雨水在巴黎市中心逼仄、阴暗的街道间流过，有些作家将这座城市比作垃圾场或没有盖子的粪池。巴比耶、雨果、波德莱尔、兰波都留下了有关巴黎臭名昭著的城市污泥的诗行^①，污泥的形象与社会的堕落和尊严的丧失密切相关，藏污纳垢的公共卫生环境是颓废派文学津津乐道的话题。

法国19世纪的这一文学传统也表现在游记写作中。今天的研究者已经习惯了文化研究和后殖民主义学说对旅行书写的观点，我们被反复告诫跨域旅行绝不是单纯的个体行为，游记也不是单纯的个体体验，而是饱含阶级、宗教、性别、种族的话语，共同建构起一个社会对“他者”的集体想象。建立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我们可以轻易得出诸如此类的结论：19世纪法国的来华游记不遗余力地刻画北京糟糕的公共卫生环境，这不仅符合他们对古老的中华帝国的颓废叙事策略，同时，这些表面上看起来客观的观察和记录，是以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为视角的，对落后的东方“他者”进行书写，最终达到强化西方“自我”优越性和先进性的目的。不可否认，上述引用的将北京与巴黎进行对比的文字的确表达了很强的西方文明优越感。然而，对北京街道脏臭与混乱的描写是否一定就是具有意识形态的卫生学？游记体现的都是殖民主义的书写策略吗？对他者的否认和贬低一定是自我确认的前提吗？旅行文本与帝国政治之间必然存在共谋关系吗？

二、身体残缺与疾病

《北京及其居民——卫生研究》的作者观察到，在北京，贫穷人家、乞丐、罪犯的家人在无法负担丧葬费时，衙门就负责把尸体埋

^① Antoine Compagnon, "Poésie de la boue", in *Les Chiffonniers de Paris* (Paris: Gallimard, 2017), pp.76-82.

在田间，但往往敷衍了事，死者刚入土，尸体就被野狗撕碎了。死刑犯的尸体被随意抛入井中，头骨被悬挂在断头台上。这一切都使北京城内终年飘荡着腐尸散发出的臭味，但来往的商贩与路人早已习惯，对此熟视无睹，这种冷漠的态度被所有的来华游记作者都表现过。

莫拉兹的职业是医生，正像他的作品标题所表现的，他的意图是从城市卫生和居民健康角度来考察北京和北京人的生存状态。由“尸体—野狗—乞丐”组成的“食物链”对城市的生态环境构成威胁，它会留下疫病的隐患，但是作者的惊讶显然更多地来自于北京街头以最直白的形式暴露出的人体残缺与疾患。在这里，我们要展现在此期间来华游记中被刻画得最多的群众演员——乞丐。

《中国游记》中描写了北京城里众多的乞丐群体：晚上他们住在城墙边的棚屋里，天一亮就会占据北京最繁华的街区，甚至在宫殿门口行乞。乞丐大多身体残疾，患有皮肤病，褴褛的衣衫无法掩盖他们的身体缺陷。他们在垃圾堆里翻找食物，有的乞丐患有癫痫病，在地上打滚，还有的患有精神疾病，他们跳舞、大笑，或用其他疯癫的举止吸引别人的注意。然而，面对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路人的态度是冷漠的。

在另一本游记《北京及中国腹地》中，作者同样对北京的数万名乞丐的生活环境进行了讲述：他们的生存状况极为糟糕，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身上长着疮疤。北京城内有数不胜数的人依靠施舍过日子，政府的慈善机构形同虚设。中国人对他人非常冷漠，当看到自家门口有濒死之人时，主人就会立刻把人赶走，因为“法律规定在谁家门口发现尸体，由此户人家出资安葬”^①。《北京及中国腹地》（1878）的作者罗淑亚分别在1868—1872年以及1874—1876年间担任法国驻华参赞署理公使，这本书记录了他在中国的生活和游历。

我们在考察这一时期的旅行文本时，不能忽略旅行者的身份，无

^① Julien de Rochecouart, *Pékin et l'intérieur de la Chine* (Paris: Plon, 1878), mise en format texte par Pierre Palpant, www.chineancienne.fr, p. 84.

论是布尔布隆，还是罗淑亚，都是法国的高级外交官，他们很自然地会站在殖民主义者的立场上观察、思考与言说中国社会，从而使这些文本带有明显的西方文明优越感，即使在触及最为悲惨的社会问题时，他们的写作风格也是冷峻的，使观察保留了高度的现实性和客观性。疾病在他们笔下是社会性文本，是用来描绘社会混乱的一种修辞手法。疾病与社会腐败之间的隐喻关系，苏珊·桑塔格早已指出：“在整个19世纪，疾病隐喻变得更加恶毒、荒谬，更具蛊惑性。存在着一种与日俱增的倾向，把任何一种自己不赞成的状况都称作疾病。”^①对疾病的表现，即使是写实的，也是指控性质的。

当然，除殖民者以外，这一时期来华游记的作者还有传教士、医生、汉学家，他们的作品中表现出更多的人文主义精神，即人对同类的怜悯，这一点如果说在军医莫拉兹的作品中还较为模糊的话，那么，冉默德的写作则将怜悯之情表达得更为明显。冉默德是东方语言学院的中文教师，沙畹（Edouard Chavannes）曾跟他学习中文。《北京——对中央帝国的回忆》（1887）记录了他在北京的见闻和感受。当时，西方人抵达北京的线路通常是从香港进入中国，再走水路到海河上岸，然后驱车从通州到北京。在还未到达帝都之前，北方的疮痍与凋敝就已作为序幕预示了赤贫和死亡等固有主题。

冉默德在进入北京城门前，首先看到的是三个来自山东的饥民，其中两个人正在向路人祈求怜悯，而另一个则躺在路边，奄奄一息。乞丐形象一直伴随着作者对北京的探索，他在后面的文字中，还有对乞丐更加仔细的刻画：“他（乞丐）在那里一待就是几个小时，不断地重复着求人怜悯的话，他衣衫褴褛，而没有衣服遮蔽的地方更是刺眼，这破衣烂衫也只能将满身的溃烂掩藏一下，这些疮口则是由不讲卫生和营养不良造成的，在炎热的天气里，引来无数蝇虫……你能想象的北京乞丐就是这个样子，无论谁见到他，都会因人类能沦落到这副可

① [美]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程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第71页。

怕的模样而软了心肠，口袋空空地回家。”^①我们看到，这里流露出的怜悯之情是不言而喻的。

乞丐代表了最极致的堕落。“在这些令人作呕的人身上表现的是邪恶与肮脏。他们有的人躺在地上，有的躺在同伴的身上，人擦着人，层层叠叠，那是一堆又一堆的胳膊、脑袋以及遍布烂疮的散发着恶臭的肉体。不远处，另一群人围着一口锅，像野兽一般大口地吞咽里面的剩菜剩饭。”^②作者评论说，“此情此景，即使如左拉一样能言者也难以描绘其中丑陋的现实”^③。众所周知，左拉的名字与自然主义文学紧密相连，生活在巴黎都市化走向高潮的历史时期，他不仅借助科学和客观的视角检验和刻画病理学层面上的疾病，还以巴黎的大都市生活为中心表现社会的堕落。冉默德在这里联想到左拉发人深省，左拉笔下城市的罪恶与人性的邪恶与作者眼前大清帝国的倾覆和惨不忍睹的赤贫，其意义都指向了人间地狱，区别在于前者是资本主义野蛮发展的结果，表现了现代化的摧毁性，后者则是封建社会的腐朽制度必然引发的停滞与落后。

三、病态、罪恶与颓废

肮脏且带有残疾、变形或疾病的乞丐是19世纪法国来华游记中的典型形象，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赤贫是颓废的象征，代表着病态或罪恶的极致，不仅是社会问题，也是人性话题。事实上，19世纪下半叶，法国作家对各种反常和病态的话语都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在这里，我们除了要考察这一时期来华游记中的现实主义元素外，也不能忽视世纪末法国各种文学思潮的影响。

① Maurice Jametel, *Pékin, souvenirs de l'Empire du Milieu* (Paris: E. Plon, 1887), mise en format texte par Pierre Palpant, www.chineancienne.fr, p. 155.

② Ibid., p. 157.

③ Idem.

19世纪,西方文学经过了从浪漫主义对病态的欣赏到世纪末颓废派对病态的夸耀这一过程,其中表现出来的不同于健康的审美趣味被视为现代美学的标志。^①我们在这里对颓废美学进行参照,绝不是为了证明来华游记中对晚清社会病态的刻画是为了彰显美学的优越性,而是有必要强调,处在19世纪下半叶的旅行文本写作离不开法国当时的文学氛围,即自然主义者以伦理的方式使病态在文学中获得位置,象征主义者以美学的方式使病态得以诗化。虽然不是人人都能如波德莱尔一样具有从恶中挖掘美的才华,但是,病态与颓废是世纪末法国文学的重要主题,是反思社会和表现人性的合理内容。我们会发现来华游记并不满足于对病态的单纯描写,作家们也会对病态的根源进行分析与思考。

德特利在《十九世纪西方文学中的中国人形象》一文中指出,“野蛮、没有人性、动物般,诸如此类的修饰语最能概括十九世纪的人们对中国人的看法”^②,对于一个走向衰落的帝国,就连居住在这里的人往往在叙事中也有着“去人化”的倾向。我们发现,在这一时期的游记中,中国乞丐几乎全部失去了人形,不仅沦落到与狗争抢食物的境地,还会把浑身生满疥疮的野狗当作美餐。“死掉的动物在路上不会停留很久,它们总是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迅速消失,除非是深度腐烂的肉,否则绝不会让那些最为饥饿的人们放弃。”^③从现实主义角度来看,这些文字无疑表现了晚清真实的北京,人被异化为野兽或是回到动物状态,在这个由非理性所控制的野蛮世界中,对一个西方人来说,站在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立场上进行思考是很自然的。莫拉兹不仅考察了中

① 杨希、蒋承勇:《西方颓废文学中的“疾病”隐喻发微》,《外国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第72页。

② Muriel Détrie, “L’Image du Chinois dans la littérature occidentale au XIX^e siècle”, in *La Chine entre amour et haine, Actes du VIII^e colloque de sinologie de Chantilly*, éd. Michel Cartier (Paris : Desclée de Brouwer, 1998), p. 416.

③ Georges Morache, *Pékin et ses habitants, Etude d’hygiène*, mise en format texte par Pierre Palpant, www.chineancienne.fr, p. 29.

国城市的卫生情况，也对晚清社会的赤贫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思考。他将作家和医生两个身份结合起来，试图找到清帝国这个腐烂社会的病因。在他看来，贫穷是中国普遍可见的现象，造成中国贫穷最重要的原因是土地与人口的失衡，赤贫使底层人民除了抢劫以外再没有生存的可能，像太平天国这样的反抗表面是出于政治原因，说到底还是饥饿导致的，社会动荡最终又加剧了社会的贫困，这种恶性循环使得贫困与中国社会如影随形。莫拉兹用整整一章刻画了北京的贫困图景，他通过乞丐、弃婴、妓女和太监等边缘人物，向西方公众展现了一个被赤贫重重包裹的帝国都城。

莫拉兹根据官方统计声称在北京约有七万多乞丐，他们处境悲惨，营养匮乏，居无定所，这种生存状况使他们容易染上各种疾病。随之而来是极高的死亡率，疾病、严寒、饥饿和绝望都会给他们带来生命威胁。贫困还导致未成年人的夭折。长久以来，欧洲国家普遍流传着中国人弃婴和杀婴的传闻，莫拉兹对这种说法进行了驳斥，他指出儒家文化使得各阶层都非常爱护自己的孩子，路边出现孩子的尸体是因为家里负担不起丧葬费，并非传说中杀婴和弃婴那般骇人。中国儿童死亡率高是由于苦难而非罪恶造成的。总之，“乞丐、死婴、卖淫，这些构成了北京城的贫困图景”^①，社会的颓废还有其他的表现，比如犯罪问题，因为“贫困、救济机构的缺失以及自私自利都会产生邪恶，而邪恶导致犯罪”^②，作者区分了贫困与罪恶，在他看来，贫困是罪恶的根源，帝都的“贫困图景”也是国家衰败的有利证明。

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倾向于将19世纪西方文学刻画中国人的动物修辞视为殖民主义从西方中心出发的、对“他者”做出低下价值判断与伦理判断的依据，我们似乎忽略了以左拉为代表的世纪末法国作家同样将西方的大都市巴黎比喻成动物世界，“在早期的寓言《猛兽的

① Georges Morache, *Pékin et ses habitants, Etude d'hygiène*, mise en format texte par Pierre Palpant, www.chineancienne.fr, p. 122.

② *Idem*.

牢笼》中，左拉透过两个动物的眼光看巴黎，他把巴黎比作动物笼子，把里面的人比作动物”^①。可见，表现人的“非人”处境和世纪末表现城市病态、人性罪恶与社会颓废的文学潮流一起，延续了法国文学的人文主义传统，即使它的风格是冷峻、严厉、甚至是狰狞的。如果说传统的审美是建立在读者的愉悦体验上，那么世纪末的审美则着力在他们的震惊体验上，以颓废和“审丑”唤起读者对人性的思考，这种趋势“发端于19世纪末自然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以及颓废派等先锋文学的‘反传统’大合唱”^②。

动物修辞还表现在对中国人群的刻画上，中国因为人口众多，民众的形象似乎永远和蜂群或是蚁群密不可分，游记作品里的人物通常是匿名大众。在这些作家的笔下，民众不仅没有理性，也没有名字。由嘈杂人群带来的混乱和危险的感觉有时还会被除了国家衰败以外的另一因素强调，那就是中国人不信教。在西方人看来，信仰缺失是中国民众表现反常的主要原因。《北京及其居民——卫生研究》的作者把北京与南方城市做了对比后指出：“基督教徒在上海和广州开设了诊所救治病人，本地商人也建立了一些相似的救济机构；但在北京，这类机构一点也没得到发展，政府也不打算为其子民提供庇护所。”^③对这一时期来到中国的西方旅行者来说，政府对贫苦大众的情感麻木与宗教信仰的缺失有很大关系。

布尔布隆夫人的游记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宗教在一个国家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中国则不然，中国人所追求的是财富和物质享受，对精神追求和宗教信仰不感兴趣，中国人的这一特点解释了在中国传教的困难。布尔布隆夫人告诉她的读者，虽然中国人不信教，但北京

① 陈晓兰：《罪恶之城——左拉小说中的巴黎》，《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66页。

② 蒋承勇、曾繁亨：《震惊：西方现代文学审美机制的生成——以自然主义、现代主义为中心的考察》，《文艺研究》2020年第2期，第64页。

③ Georges Morache, *Pékin et ses habitants, Etude d'hygiène*, mise en format texte par Pierre Palpant, www.chineancienne.fr, p. 43.

却不缺少宗教建筑，宗教的作用体现在审美性和娱乐性等信仰以外的其他内容上，比如，在1861年咸丰皇帝的葬礼上，人们召集了全城各类宗教的主理人，目的是增加葬礼的排场和气势^①。

对中国民众务实且毫无信仰的最极致体验莫过于冉默德在《北京——对中央帝国的回忆》中的讲述了，作者说北京人对布施的态度极为敷衍，作者的马夫丢给看守天坛的僧人几枚铜钱，那态度就像对待吃不上饭的难民一样。而这几枚铜钱还不仅仅是虔诚的表现，它兼具势力的实用价值——保佑马夫出入平安。求神保佑居然是可以买卖的，这在作者看来十分不可思议：“中国人的信仰就是这样的：粗俗不堪的迷信就表现在日常粗俗不堪的崇拜形式上。”^②在西方人眼中，能够纳入进天主教教义体系里的就是可以理解的，反之，中国人不信教或迷信，这使其行为难以被西方理性所解释，最终归入堕落的范畴。

综上所述，来华游记的作者虽然有着观看者和书写者的特权，将北京塑造成没落帝都的形象，但是，我们也得公正地指出，对于疾病的书写始终是具有伦理维度的，每当他们的文笔触及贫困与病态等内容时，书写者用怜悯等情感填补了与被书写者之间的距离，他们对不幸的根源追问不休，诚然，其中大多数人止步于自身认知的界限，最终将清末中国社会的病态与颓废归结于宗教的缺失上。

结 论

贝尼尔在《世纪末与异国情调——论远东游记》一文中指出，随着19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的发展，在西方世界产生了一种对现代

① Achille Poussiégué, *Voyage en Chine et en Mongolie de M. de Bourboulon, ministre de France et de Madame de Bourboulon*, mise en format texte par Pierre Palpant, www.chineancienne.fr, p. 173.

② Maurice Jametel, *Pékin, souvenirs de l'Empire du Milieu*, mise en format texte par Pierre Palpant, www.chineancienne.fr, p.148.

化的焦虑，探索远东似乎成为改善社会的希望，随之展开的远行带回两种截然不同的对东方的感受：一种是由文化冲突造成的彻底的幻灭及由此而来的关于东方的负面形象，另一种是坚定不移地将东方视为传统与不变的世界及由此而来的理想化的形象。这两种形象中都包含了诸多刻板印象，共同组成了言说东方的历史性话语。对于前者，是在“黄祸”的阴影下形成的把中国人刻画成贪婪、残忍、懒惰、虚伪、懦弱、愚昧、落后形象的潮流，国民的堕落与帝国的衰败相伴相生，这些陈词滥调的生成无一不以西方人的优越感和欧洲中心主义为前提；对于后者，则是一些为了质疑和拒绝现代性的知识分子满怀憧憬地将目光投向东方，由此生成的文学话语完全建立在想象的他者之上，从给他者创造神话开始，真正的目的却是自我定义，即使其中仍然包含欧洲中心主义的色彩，但西方文明受到了质疑和反思，人们“至少在理论上开始承认另一种不同于自己的发展是可能的”^①。

1860—1880年间将“中央帝国”及其都城的形象带回法国的人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第一批得以进入这个神秘地带的外交官、军医、记者、翻译等，他们在社会阶层上绝对不属于文化精英，而为他们的远行提供机遇的正是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的帝国主义殖民背景。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这些游记表现出来的都是贝尼尔所定义的对东方国家的前一种态度，即对肮脏、病态和破败等负面形象的描绘和在此过程中流露出来的西方文明优越感。但是，除此之外，影响旅行者认知与书写的还有法国世纪末的颓废美学和自然主义对病态的关注。至于后一种态度，即着力在想象和理想化的形象上的作品并不多见^②。反布尔乔亚大众审美的个人主义精英立场在这一时期书写北京的作品中并不明

① Lucie Bernier, “Fin de siècle et exotisme: le récit de voyage en Extrême-Orient”, *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1(2001), p. 61.

② 法国驻福州的领事席孟 (Eugène Simon) 的《中国城市》(*La Cité chinoise*) (1885) 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他延续了启蒙世纪对中国文化的肯定和激赏，这部作品对托尔斯泰和辜鸿铭产生过很大影响。

显，人们要等到世纪之交，甚至20世纪初的谢阁兰笔下，才能看见一个对着饱含泥浆与浊流、泛着恶臭水泡的御河发呆的西方人，听见他咒语般的倾诉：“这些粘粘糊糊的水中的倒影，这些从淤泥的不可测度的深处冒出来的东西……为了显示内廷的神秘美妙，同时显示它的不可探求。”^①

① [法]谢阁兰：《勒内·莱斯》，梅斌译，郭宏安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33—34页。